

存在意义的追寻

——七等生《我爱黑眼珠》的哲学隐喻

岁 涵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摘 要:七等生的小说《我爱黑眼珠》颇具争议,我们应避开知性与常识之自明,以形上超越的视角对作品进行解读。其实七等生以李龙第的故事寄寓了自己的生命哲学:其一,生死观。即面对死亡,“向死而在”、“出死人生”的勇气与大智慧。只有把个人嵌入死的境界,才能使人从对死的必然性的领会中豁然醒悟,自由地开展自己最本己的能在,实现自我存在之价值。其二,生命时间观。在时间三相中,过去已不堪抚触,未来亦不可知,唯有当下一刻坚实而明亮,切断了“前”“后”两个向度的精神迷路,人应在当下本真的生命中担起自己存在之责任。

关键词:存在;生命哲学;时间;责任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0)04-0080-04

五十年代中期的台湾文坛,由于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介入,传统观念受到猛烈冲击,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学形式和表现手法也面临新的挑战,出现了一批以“新”、“乱”、“怪”为主要特征的西化作家。尤其是七等生,更被誉为台湾文坛上的“怪中之怪”。他的小说文体形式奇特怪异,语言艰涩阴晦,逻辑违反常理。王拓认为“他的小说似乎太注重个人的内在经验与冥想世界”,“说句良心话,我读不懂”![1]

在七等生的小说作品中,读者、评论界争议最强烈的莫过于他的短篇代表作《我爱黑眼珠》,争议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主人公李龙第为何面临灾难时抛下自己深爱的妻子不顾,突然“移情别恋”,去救助和关怀一个素不相识的妓女。这被认为是一个难解之谜。评论

家们都试图给这个难解之谜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大致有以下几种:其一,根据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论,指出李龙第置自己妻子的呼喊于不顾而去照顾一个妓女是典型的“原我”显现,这正暴露了他龌龊的灵魂。其二,认为李龙第救人于危难,体现了怜悯、人道及人类爱,表现了他超越世俗的仁爱精神。其三,这是一个关于在理想与现实中选择命题,晴子象征理想,妓女象征着现实社会,现实的苦难急需有人担起责任。其四,认为小说所要阐释的是一个关于爱、责任及存在的问题。[2](P183-186)

笔者认为,以上评论有些较牵强附会,有些因只触及皮毛而流于肤浅。我们的误读往往在于阅读过程中受到某种根深蒂固的情绪的支配,而产生一种解释学的迷障,这种迷障

收稿日期:2000-05-12

作者简介:岁涵(1973—),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98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实际上源于我们固有的意识形态、常识、“集体表象”以及我们久已习惯了的价值期待。小说以梦魇的形式写成,通篇笼罩着怪异、飘忽、阴霾的梦魇气息。作者表述的并非现实生活,因此我们在解读过程中也应进入“梦”的状态,避开知性与常识之自明,调整为形上超越的视角。正如小说题目所提示于我们的:“我爱黑眼珠”,美丽明亮的黑眼珠所透视的是人的灵魂,所倾听的是人的心音。七等生的作品大都是他自己心象的记录。他曾说过:“我纯然为我掌握的理念写作。”[2](P185)他在他的小说全集的《自序》里写道:“在那些长短不一的篇章里,外在的世界与内在的世界,我都兼顾到;对于自我与世界之间,我完全依照我的习性、感情和理念记录我在生活中经验的事,甚至以我为主题,来探索生命哲学。”[3](P110)《我爱黑眼珠》便是七等生对其生命哲学的阐释,李龙第的故事便成为关于他生命哲学的一种隐喻。

事实上,小说开篇便为我们点明了主人公李龙第与众不同的特殊身份:隐居者。一个绝对不是很乐观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无职业,靠妻子的微薄薪水度日;他从不与人交往,常常一个人独自散步;并且有深邃的思想,生活在与现实世界相隔离的内心世界里,与世无争。在市区的公共汽车里,透过他的眼睛展示给我们的是现实世界的荒诞不经与令人厌倦:爬在窗边听车轮刮水声而兴奋欢呼的无聊青年;赤足褴褛的工人,有着怪异的坚硬削瘦、象用刀削过的不均木棒般的手臂;热烈地谈论着雨天消遣的狗熊样的男人;狂逛的语声中夹着粗野方言的欢快小伙子。这幅雨天场景构成了李龙第眼中怪诞荒谬的现实世界。他以超脱的姿态俯视这一荒谬的生存环境,外在世界已无法影响他,他活在自己内心的世界里。因此,在店铺老板喋喋不休地指责自己的妻子时,他同样采取的是一种超脱姿态,“脸上挂着呆板的笑容”[4](P466)听他述说着,毫无愤激的情绪,隐者身份的设置为我们进一步解读七等生所要阐释的生命哲学提供了一个契机。

从哲学意义上讲,隐者象征着一种超越“常人”的存在,即海德格尔(Heidegger Martin)所谓的“人的本真的存在”。隐者之外的他人是以“常人”的姿态出现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指的正是处于“常人”支配下的人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共在完全把本己的此在消融在‘他人的’在的方式中”,“‘常人’展开了对他的真正独裁”[5](P147)。海德格尔认为“常人”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支配引起人的平均化后果。这一后果导致个人失去独立性的自由,取消了个人所承担的责任。当个人失去了自己本真的在时,海德格尔称这种状况为“此在的沉沦”[5](P204)。隐者以脱离了非本真沉沦者的姿态出现,是一个处于本真状态的“此在”。他超越的神性处于清醒之中,他始终保持着自律而不随波逐流。

当洪水淹没了城市,灾难覆顶时,面对死亡,李龙第所象征的“人的本真的存在”对待死亡的一颗平常心与“常人”争先恐后向上攀爬,相互挤压践踏的求生窘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心里感慨的想着:如此模样求生的世人多么可耻啊,我宁愿站在这里牢抱着这根巨柱与巨柱同亡”;“他暗自伤感着:在这自然界死亡一事是最不足道的”,“他庆幸自己在往日所建立的暧昧的信念现在却能够具体地帮助他面对可怕的侵掠而不畏惧”。[4](P467)那么这“暧昧的信念”指的是什么呢?作者正是在这里阐述了他的生死观,即面对死亡“向死而在”,“出死入生”的勇气与大智慧。

人的在世是一个注定死亡的存在,死是此在的不可超越,不可避免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认为,面对行将到来的死亡,只有“先行到死中去”[5](P301),即把个人嵌入死的境界,才能使人对死的必然性有所领会;使此在从沉沦和异化状态中醒悟过来,不懦弱地逃避死亡,自由地开展自己最本己的能在,积极设计自我,实现自我的存在价值。当洪水到来时,李龙第是“如此心存绝望”[4](P467),也正是因为对绝望的体认才使得他在死之前安之若素;也只有在对死亡的超越境界中才

能获得真正的生之自由。因此,只有他一个人在这因灾祸而失去了光华的人造城市中能够“高举着挂雨衣的左臂,显得更加平静”[4](P468)。

在以上问题解决之后,我们的解读还面临两个谜题:

谜题之一,如小说开头所告诉我们的,李龙第深爱自己的妻子,妻子在这孤独的世间是他唯一的亲人与温暖。他与妻子约定在戏院见面,在买戏票后,他特意买了妻子爱吃的有葡萄的面包,甚至为妻子买了一朵对于他已相当奢侈的香花,然而当洪水到来,他救助了一个妓女时,他内心却自语着:“我但愿你已经死了:被水冲走或被人践踏死去,不要在这个时候像这样出现,晴子。”[4](P469)若从常识出发来理解这段独白,势必得出:这是李龙第“原我”的显现,龌龊肮脏的灵魂的真实暴露。事实上,作者的用意并不如此,这样解读也造成小说前后的矛盾与突兀,显然行不通。作者在这段独白里所要表达的是“爱苦”。李龙第深知自己与晴子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使他对妻子的救助成为不可能,而他又对其苦难牵挂于心。将此引申就是:活着是苦难,使我不能放心;死了便是苦难的终结;因此死了,我就安心。鲁迅在其《野草》的《过客》一篇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处徘徊,祝愿他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这是对生之苦难的深刻了悟。

谜题之二,即李龙第的突然“移情别恋”。李龙第的“移情别恋”是作者生命时间观的一种隐喻,也是小说的题旨之所在。人生在时间中,生命的历史是从一个“终端”：“出生”，走向另一个“终端”：“死亡”。在这一过程中，“此在只是‘向前’生存着而把一切曾在‘留在身后’”。[5](P422)海德格尔认为“在两条界线之间的一段时间[Zeitspan]是赋予此在的，此在遍历这段时间的方式是：它向来只在现在是‘现实的’，就仿佛把它的‘时间’的一一相继的现在都跳跃一遍。”[5](P423)换句话

说,人生恰如走路,是一个过程,而非目的,人在行进中是作为一个“中间物”状态存在的,根本不存在超越人生之外的永恒实体。

小说中灾难的巧妙设置恰恰切断了时间的连续性,过去已不再,未来亦不可知,唯有现在(当下)是真实的,这正是执着于当下的一种时间观。“生命像燃烧的木柴,那一端的灰烬虽还具有木柴的外形,可是已不堪抚触,也不能重燃,唯有另一端是坚实和明亮的。”[4](P473)灾难使时间凝滞于“当下”一点上,生命也正是由“当下”这无数个瞬间构成。对于过去,灾难造成这条鸿沟使李龙第感觉不再是晴子的具体的丈夫,而变成了亚兹别,他要在当下一刻担起他存在责任。如果“反而我呼应你”,即向过去逃避现在,“我势必抛开我现在的责任……我就丧失了我的存在”。[4](P469)这正如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所塑造的查拉斯图特拉一样,在查的眼中,人生只不过就是“一根悬在深谷中的软索”,“往彼端去是危险的,停在半途是危险的,向后瞧也是危险的”,“人类之可爱处,正在它是一个过程与一个没落”,因此,人类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向星外找寻某种理由去没落去牺牲”[6](P9),而在于立足大地,活在当下。所以,李龙第如查拉斯图特拉一样,处境艰险,孤独而无人理解,但他“灵魂平静得很”[6](P17)。

在时间三相中,晴子象征着过去,妓女象征现在,对于李龙第来说,过去已“不堪抚触,我们不能无耻地‘拿往事来欺诈骗现在’”[4](P473)。他深刻体悟到人身不由己生存于这个世界上“被抛”的事实,“常人”沉沦于这种状态中,轻松苟活;而他作为一个清醒的智者不甘于束缚,他倾听“良心”的呼唤,断然前行。他既不向过去索求,也不向“天国”寻求援助,他否定任何独立于人的永恒的终极实体,他截断了“前”“后”两个向度的自欺欺人的精神逃路,在当下本真的生命中承担起自己存在的责任。他坚守自性,彻底走向在世,在自由自律的状态下做出了抉择:“我们必须选择,在现状中选择,我必须负起我做人的条

件,我不是挂名来这个世上获取利益的,我必须负起一件使我感到存在的荣耀之责任。”[4]

由此可见,李龙第并没有“移情别恋”,他一面因深爱晴子而“暗暗咽着泪水”[4];一面为救助那个妓女而负起当下之责任。

七等生在李龙第身上寄寓了自己的生命哲学。他以一双洞悉世事的慧眼识破人生苦难与绝望的本质,向苦难与绝望做“出死入生”的反抗。正如跌入冰谷中的那团“死火”,七等生在“冻灭”与“烧完”之间选择了“烧完”[7]。这便是七等生对于存在意义的遁寻。也正因如此,他的孤独与不被理解终成为一种宿命。

在如此短的篇幅里,七等生阐释了他深

奥玄妙的生命哲学,他的思维、感受与体验的超常规,使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地位。文如其人,七等生本人就是一个隐遁的怪人,他无固定职业,曾浪迹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正如李龙第对晴子的怒骂与众人的指责置若罔闻一样,七等生坚守自己的信念,与世无争又我行我素。评论家尉天骢在他《隐遁的小角色》一文中评七等生说:“他隐于嘲弄,白眼,屈辱之中,他仍然活着,不哭呐喊,不去抗议,不把痰吐在别人脸上,他只依照自己选定的方式生活着。”[2](P172)。他就是如此的卓而不群,独立于世。在他隐秘的内心世界里,自卑与自傲相互纠结;执拗与洒脱合为一体。他就象寂寥远山中的一可孤伶的树,在寂寞中狂舞着。

参考文献:

- [1] 闻毅.台湾西化文学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0,(2).
- [2] 田锐生.台湾文学主流[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
- [3] 王常新,李旭初,江少川.台湾文学教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 [4] 七等生.我爱黑眼睛[A].张葆辛.台湾作家小说选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 [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 [6] 尼采.查拉斯图如是说[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 [7] 鲁迅.野草·死火[A].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郭志东)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I Love The Dark Eyes* by Qi Deng-sheng

SUI H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Abstract: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controversial novel *I Love The Dark Eyes* by Qi Deng-sheng should be approached and understood from a transcendental perspective. Qi Deng-sheng has, in fact, expounded on the philosophy of life through Yao Long-di, the protagonist, in two aspects: ① the attitude toward life and death, namely, one should adopt a sensible attitude toward death so as to face death calmly and naturally. ② the temporal concept of life, that is, the present is solid and tangible whereas the past is long gone and the future is unpredictable, thus one should make best of the present time.

Key words: existence; philosophy of life; time; responsibility